

# 科学家才是我们最应该追的“星”

曹刚



两周后,上海滴水湖畔,星光璀璨——包括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,约70位顶尖科学家将齐聚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。诺奖科学家代表现代科技最高水准,是全人类的财富,应当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“网红”,我们最应该追的“明星”。

淡泊名利,是他们的共同特点。科研路上的点滴突破,离不开踏实作风和“甘坐板凳十年冷”的精神。追名逐利,难成大器。也正因为低调,很多大师一直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秘书长王侯,是多位科学家的“超级粉丝”,他参与发起论坛,希望把“世外高人”请到上海,近距离分享真知灼见。不少科学家年事已高,从出成果到获诺奖,常需数十载,得奖时往往已过花甲之年。“现在不‘追’,更待何时?”

然而,网络上近来传出了一些质疑声——有些人,对娱乐明星动辄上百万元出场费习以为常,当类似的出场费与诺奖得主挂钩时,却不淡定了,批评大师得奖后“变了”,热衷于“走穴捞钱”。

不清楚诺奖得主来华的初衷、行程、交流内容和真实收获,一看到经济往来,就对动机妄加揣测甚至指责,是无力且无理的。

传播学一代宗师、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1964年在《理解媒介——论人的延伸》一书中首提“地球村”的概念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得益于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,时空距离不断缩小,国际交往日益频繁,整个地球越来越像麦翁当年描绘的那样,如同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。

地球村里最聪明的头脑,每年能面对面交流,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,实为幸事。然而,到了2019年的今天,却有人要放弃机会,



孙绍波画

逆流地呼吁:与其花钱请诺奖得主来华,不如潜心研究,培养我们自己的大科学家。

“闭门造车”的逻辑,令人费解。难道,一定要大师们亲手培养出几个中国诺奖得主,才算来得有价值?难道,顶尖科学家就应当不食人间烟火般地无私奉献?这么想,才是典型的短视和不尊重知识。

不排除有少数活动主办方,盯着名人效应,只想请大咖“站台”。这不是主流。滴水湖畔搭起的,是一个纯粹的舞台。去年论坛闭幕后,参会的30多位顶尖科学家中,超过半数给协会写信致谢点赞。他们觉得,自己是论坛的主角,全程“真聆听、真交流、真感受”,收获颇丰。追星热潮盛行多年,许多年轻人为了流量

明星趋之若鹜,却说不几个科学家的名字;娱乐圈的狗血剧情频频引发热议,但鲜有人关心科学家的趣闻轶事。殊不知,很多故事,远比那些花边新闻美好、浪漫,值得拥有更多流量。

比如,去年来沪的挪威科学家夫妇梅·布莱特和爱德华·莫索尔,一起研究“迷路”,因“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”,2014年携手捧回诺奖。夫妻俩都爱神经科学,都喜欢户外运动,因为好奇自己为何不迷路,共同组建实验室。又如,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、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·科恩伯格,与父亲同为斯坦福大学教授,还是历史上第六对父子诺奖得主……

科研课题也并非都是高深莫测的“天

书”。今年,潜心研究火星移民、癌症疫苗、阿尔兹海默症的多位大咖,都将应邀来沪。他们的成果,与全人类命运和亿万人福祉息息相关,既“高精尖”,又“接地气”。

诺奖科学家带来的积极影响,不只有励志故事,还有诸多现实意义。

大师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分享最新成果,讲述科研故事。不经意的几句交流,可能燃起一个年轻学生对科学的向往,在心中埋下兴趣的种子;可能带给青年科学家关键启发,在某项科研攻关中突破瓶颈;也可能促成项目合作,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落地转化。

推广科普、启迪科研、升级科创,辐射效应未必立竿见影,但肯定不容小觑。几年前,一项针对青少年的调查显示,52%的受访者有明星梦,想当科学家的仅为13%。为什么“从小立志当科学家”的孩子越来越少了?很大程度上与一些不恰当的标签有关——搞科研工作,就得“默默无闻”“无私奉献”“甘于清贫”……

我们要告诉孩子:如果你想攀登科研高峰,绝不能贪图名利;但是,只要你努力拼搏、不断创新,在科研上有所建树,就理应获得掌声和回报。诺贝尔科学奖的奖金是140万美元,我国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,奖励800万元。名和利,不是科学家的追求目标,却是全社会对知识和科学家表达尊重的重要手段。

“利在一身勿谋也,利在天下者必谋之;利在一时固谋也,利在万世者更谋之……”《钱氏家训》中的这段话,精辟诠释了科学家的境界:功在千秋,不看当下。娱乐八卦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,流量终究不会持续太久。时代主流其实并没有变,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研成果,会被载入史册。时间终将决定,哪一片星空最为璀璨。

群星将至,此时不“追”,更待何时?

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,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,获奖者为阿比吉特·巴纳吉(Abhijit Banerjee)、埃丝特·迪弗洛(Esther Duflo)和迈克尔·克雷默(Michael Kremer),以表彰他们在“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”。

“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微观实证研究,大大提高了人类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,提高了扶贫效率。而在当前中国进行的精准扶贫,透过‘对象要精准、项目安排要精准、资金使用要精准、措施到位要精准、因村派人要精准、脱贫成效要精准’六大精准设计,目的也是要保障和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。”昨晚,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褚荣伟在解析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,这个奖项与中国的精准扶贫可谓“不谋而合”。

## 采用“随机控制实验”发现“扶贫要先扶志”

作为一位专门从事底层贫困、尤其是流动人口工作研究的学者,褚荣伟介绍,三位经济学奖得主采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,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思路。哈佛大学的克雷默是较早采用这种新思路的,麻省理工学院的巴纳吉和迪弗洛发展了这一新方法,“他们改变了全球扶贫工作的现状。”

那么,这种“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”,究竟是什么?褚荣伟说,英文简称RCT,中文翻译过来称为“随机控制实验”——它是指在一次研究中,采取两种实验措施,并将受试者随机分配到其中一组的实验方法。另外,它强调在实际经济环境中进行田野实验:打个比方,针对面临类似贫困问题的两组进行测试,一组每天给他们每人每天10美元,另一组一分钱也不给,观察他们的今后几周甚至数月后的生活变化;当然,干预工具还包括提供教育、技术等。

实验范围广泛,而且耗钱耗时。十多年的时间,三位经济学奖得主深入亚洲、非洲的世界上最贫困农村,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即“随机

# “他们改变了全球扶贫工作的现状”

通过微观实证研究提高扶贫效率,三位学者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



阿比吉特·巴纳吉(麻省理工学院)

Abhijit Banerjee



埃丝特·迪弗洛(麻省理工学院)

Esther Duflo



迈克尔·克雷默(哈佛大学)

Michael Kremer

图新华社

控制实验”,从穷人的日常生活、教育、健康等生活的多个方面,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。

褚荣伟说,事实证明,三位学者的实验大大改变了全球扶贫工作的效率。巴纳吉和迪弗洛后来写下一本著名的书《贫穷的本质》,在书中,他们解释了许多贫困现象: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?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?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,却要自己花钱买药?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?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、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?

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,从实证的角度挑战了一个观点——穷人缺钱,所以援助穷人得靠钱。但相关研究却发现,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,外部援助并不起决定作用。相反,要改变穷人的认知,让他们自救自助更为关键。这其实与中国传统的智慧中的“授之以鱼”与“授之以渔”差别是同一个道理,也与“扶贫要先扶志”如出一辙。

## 中国“实现精准扶贫”需要“掌握有效数据”

结合中国的实际,褚荣伟介绍,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扶贫的伟大成就。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末的7.7亿人,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,累计减贫7.4亿人,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,贫困发生率也从97.5%下降到3.1%,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七成。2018年,全国又有125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,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。

不过,褚荣伟同时指出,虽然成就卓著,但这场脱贫攻坚战却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候,这场大考不仅仅需要更大的决心与信念,还需要一场思维的变革,如何认识理解贫困,就决定着我们会如何减少贫困,我们要减少什么样的贫困。这里,除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,还要基层科学的指导。在局部地区或

特定的致贫原因情境下,从经济学奖得主的“随机控制实验”的思路中汲取相关经验,不失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效率的高招。

褚荣伟举例,从上世纪80年代起,一名外国学者采用类似思路,研究我国农村儿童的教育和营养等问题,获取了一系列关键数据,对于政府关注农村儿童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可惜,国内的研究团队目前还很少涉及这一领域,进入贫困山村支教的人越来越多,但研究贫困、掌握数据的人很少。褚荣伟希望,当地政府、高校或研究机构、民间组织等各方,需要共同努力,能在贫困地区采取类似的思路,一方面找寻合适有效的干预手段,另一方面创造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创新模式,基于科学的数据指导调整实际的活动,从而保障扶贫的精准效果,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。其实经济学家的这种思路,对于金字塔底层的商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本报记者 张炯强